



序章

研究日本文学史
的几点思考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地理文化环境与文学
——文学史的史期划分——文学史的方法论

第一节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在各国各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不同的演变过程。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从文学的演进来说，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都经历了一个文化未分化的混沌时期，使用当时已形成的语言，采用口传的形式而留存下来，后人写史，称为“口头文学”。自从文字出现以后，“文学”这个词最早含有文章和学问的双重意义，泛论抽象为“文”，“文”和“文学”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含义，往往规定为文史哲的总称。“文学”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比如，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94）的律令制度下，“文学”曾被作为教授亲王经书的一个职名。江户时代（1600~1868），“文学”又用作诸藩儒官之称，脱离不了

“学术”这个概念的范畴。

因此 近代以前 文学史最初并未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历史系统,一般都被网罗在“传记”或“正史”之中。文学史之归于“历史”的一个专门分支 乃是近代的事。在日本 尽管在近代以前曾经有过写和歌或文章变迁的书,可以视作文学上写史的萌芽阶段。在近代,于 1890 年出版了芳贺矢一、立花铁三郎的《国文学读本》只记述了国文学的沿革 将文学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系统来著述,形成文学史体的,则是始于 1890 年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受西方在文学上著史的启发而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它记述了文学史的起源 并按时代划分叙述了奈良朝、平安朝、镰仓时代、南北朝和江户时代的文学发展史。作者记述中表明:“本书实为本邦文学史的滥觞”。可以认为,它是“以后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出发点”^①。在中国文学史之编作,最早是 1901 年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和 1904 年清代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由此看来,日本文学史研究专著的问世比中国早 11 年乃至 14 年。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问题,涉及文学的定义问题。近代以来,一般接受了拉丁语 Literature 一词的定义,开始将“文学”完全作为一种独立的文艺形态,专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日本学界界定为以语言作为素材,凭借想像力表现思想、情绪、美的感动的艺术。他们突出了文学的“主情论”也就是文学演进所体现的人性。我国对“文学”的阐释,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点 与一般的定说是一致的,但强调了文学的“反映论”文学是以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多方面的社会作用;更强调了文学是意

^① 市古贞次主编:《日本文学全史·上卷 I》第 1 页,学灯社 1979 年版。

识形态领域。

二三十年代以来 我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 受到当时苏联‘拉普’的‘辩证唯物创作方法’的影响 混淆了世界观和文学创作方法的区别，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强调了“政治第一”、“政治首位论”。在一特定时期里 文学更被简单地作为意识形态之一 强调了它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 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文学也就成为一种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极端地说 文学史也简单化为社会政治发展史的附庸。

事实上作为文学 不仅有其阶级性 而且有其作为人的美的感动的共同属性，更重要的还有其内在精神的不朽性。毛泽东就说过：“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美 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 有同嗜焉’”^①。这充分说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有共同的美感 而且郑振铎认为“他 文学 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 虽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 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 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上 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中略）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 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 中变异着 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 演化着 然而却是一个 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②

这是古今无分 汉和无别的。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和春

① 何其芳：《毛泽东之著作》，《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②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5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秋时代的《诗经》、平安王朝的《源氏物语》和清王朝的《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 超越民族和阶级 流传至今 盛而不衰 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的瑰宝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此，它们能给人类一种最崇高的情思的感怀，一种共同的美的享受。

因此 新时期文学上的拨乱反正 首先从文学观念的更新开始 否定了“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 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既定观念 逐步摆脱将文学简单的政治化的窠臼 恢复文学的普遍定义，回归文学的主体性。同时，随着文学观念的多元化转变，80年代中后期 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而且一直延至 90年代 发展到“重写学术史”的问题 即包括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广泛的学术史问题。在文学史方面 探讨了在旧的文学观念支配下 文学史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 比如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 忽视史的实证考据、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合理价值和文学进化观的意义；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阶级分析方法僵化的倾向，乃至存在另一种全盘西化——“全盘苏化”的倾向。同时 努力摆脱文学史的附庸地位 构建独立的文学史研究的新体系 并开始加以实践。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在外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存在同样需要重新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新体系问题。

自此以来 我们就此问题进行了思考 涉及文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首先文学史的研究需要突破带有惰性的文学史模式 在史的结构框架内 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中轴 纵横于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本体结构和语言及其表述几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尽相同的环节中，并有重点地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多向性的、历史的动态分析 通过纷繁的文学现象来把握其文化

特征和美学内涵，以及日本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对象是包括各种文学的内容、形式、文体、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审美涵容的形成、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性 以及作家的创作经验和作品文本内在特征及相互联系和变异。尤其是作为文学发展历史河床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起初是有了文学体验和创作才有对文学的反省和自觉——当然 这是指古代一般而言 到了近代往往出现与之相反的规律 文学思想往往先行于文学创作 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的自觉彼此不断循环流变，形成种种文学思想而至文学思潮。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超个体地参照某种客观精神和观念体系运行的。文学思潮总是处在动的状态，富有流动性和生命力 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作家群的文学的主题、题材、风格、结构、审美、表现、流派 以及对作家的文学活动和作品的批评，乃至对整个文学历史的评价。从文学类型来说，研究对象还包括无文字记载的各类口头文学 从原始诸种文明混沌状态下的灵性、咒语、原始歌谣等开始 到文字文学从韵文和散文出现以后 分化出各种体裁 比如和歌、俳句、物语、浮世草子、能乐、歌舞伎等等自不消说 连史书、佛教说话、日记、散文随笔乃至汉诗文、国学 凡含文学艺术性要素的都在涉猎之内。比如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到各种文学论、美学论、艺能论、古学论都将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目前，一般文学史研究基本上习惯于对具体作家的作品、内容与形式进行孤立的、静态的评价 以及局限于小说 或诗歌、戏剧 对于其他上述诸方面领域甚少涉及。这种固定的模式很难准确把握作为文学整体内涵的文学思潮与美学思想，

以及与之相关的大文化背景，以做出历史的本质的评价。尤其是文学史的框架是以文学原理支撑的，主体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不可或缺的。文学的史的运动主要是依靠文学理论批评和作品创作这双轴来运转的。因此，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需要以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为轴心 在几个互相联系的环节中展开 以梳理各种文学类型的作家和作品 以及作家们及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彼此的联系，乃至今古域内外文学对他们及其作品的影响这些基本线索，这样文学史才能通过作品的表现 即批评的方法 更好地把握各种文学现象 深入揭示文学发展史的态势和更本质的东西。否则只孤立地就作家论作家 就作品谈作品 就成为作家论和作品论 也就是作家传记、作品评论的集合体 就会史不成史。

因此 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一是研究文学思想 但文学思想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思想 脱离文学文本形式去研究 而是要通过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来研究 回归真正的文学思想；二是要以文学思想为纲 网络作家、作品、理论、批评 并将它们置于相互联系和不同侧面 进行研究 才能更清晰、更有条不紊地达到对文学史比较完整的、论证结合的、体系化的认识。反之，研究文学史如果不包括文学思想和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 只就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进行孤立、静态的评价 就难以建立完整的文学史研究体系 全面把握文学的史与论的规律 从而也难以严密地探讨各个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历史的研究和本质的研究是文学史的基础研究 只有完成这种研究 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文学史既是一个实践的范畴 也是一个理论的范畴。建立这样的文学史理论体系 才能从总体上发现和把握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和发展的历史规

律 加深理解文学与历史、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关系 从而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新发展。

各种文学思潮起伏嬗变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从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来说，首先是文学自律性的发展和审美价值的变迁。这一点 可以从史的发展角度来审视 文学从反映不自觉的生活意识到自觉的美意识是其自律性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文学思潮最初是以文学的自觉为中心诱发的，而其诱发剂就是美学意识。因为文学创作是从人们对生活的自然感动中 比如对原始劳动生活、原始宗教生活、原始性欲生活和原始色彩生活 对大自然的光与色 的美的感动中产生的 随着文学的自觉 产生以审美意识为基准的文学意识 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萌生文学思想。

其次，文学思潮的嬗变往往超过文学本身的自律因素。因为文学在本质上内含审美价值，是以美学为其基础理论的，但又不能归结为美学这单一的层次 它与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的思想、观念、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种种思想、观念、思潮给文学思想和思潮的发展以本质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日本古代的固有的神的观念和神道思想 古代后期至近古的大陆佛教儒学思想 对于日本文学思潮的流向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具体如古代的《古事记》等所表现的崇神思想和国家意识，《怀风藻》等所表现的教化文艺观和儒学功利论，以及近古以后的劝善惩恶文艺思想倾向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再次 历史、民族、风土和社会政治条件对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发展也有着渊源关系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变革、精神结构的变化并由此而产生新思潮的要求 都足以成为各种文学思潮诞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可以认为，文学思潮

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它的发展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往往是在它们的整体制约和影响下，作为一个有机体而运动着的。

文学史研究还需要打破封闭性的、孤立性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因为各国的文学的历史，都是以本国文学传统为根基，接受外来的文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研究文学史，对外来影响的重要性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来考察文学内在发展的自身规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并展望其民族的、地域的整体特色建立一个涉及文学史发展的开放性的、地域内外相互交汇的关系问题。就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比许多国家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更广泛和更深刻。而且无论是古代之吸收中国儒佛文化和文学，还是明治维新以后之吸收西方现代人本精神和文学理念及方法，都出现过全盘汉化或欧化主义的倾向，最后在把握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在内涵上的可变性和把握与外来的东西产生整合的可能性，在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这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史的一条根本性的规律。

日本文学的发展全过程都受到外来文学的冲击。外来与固有、传统与现代多种文学因素并存，为日本文学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前提条件。日本文学民族化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由民族的、历史的、审美的独特价值所构造的一种主体精神，它决定日本文学的主体性所在，其自身有着强烈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同时日本文学又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置于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吸收消化外来的东西，使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学经过冲突、并存而达到融合的程度。其中外来文学滋养着日本文学的根，而

促使外来文学及其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却是其固有的、传统的主体性 最后建立了一个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 固有的日本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现代西方文学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

当然 建立这样一个文学发展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选择的过程。如古代吸收中国文学、近代吸收西方文学之初 就曾采取过完全“认同”或完全“拒斥”的模式。前者否定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的自律因素 而以外来的文学作为决定的因素；后者则否定外来的他律要素，无视外来文学精神所具有的促进固有的、传统的文学创造性转变的催化作用。总之，两者都未能正确把握两种文学的对立价值是一个文学整体的综合因素 而不是并列因素 因而往往将某一因素推向极端 未能为日本固有的、传统的文学与外来的文学建立一个并存融合的机制。例如，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之最初阶段曾盲目模仿中国文学，从借助汉字作为文字表现、完全模仿六朝诗学及其思想，到吸收中国佛儒道文学思想 可以说亦步亦趋 完全未注意到发挥自己固有文学的自律性和主体性的作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近代文学在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学各种主义思潮面前，也曾出现过欧化主义倾向，一度以为追求西方新潮就是新 因而迷失了传统 盲目地、只在表面层次上囫圇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学新潮。但在明治中期的政治环境刺激下，日本文学又以国粹主义来对抗欧化，将“回归古典”作为规范日本文学的根本 将日本传统的保守性、封建性又推向了极限。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从文学本身的因素来说，一是对本国文学及文学思想固有的、传统的东西缺乏自觉的认识；二是对外来的文学及文学思想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未能对两种

异质的文学及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历史的分析，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述两种极端的偏颇。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只有最自觉地认识自身文学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才能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学及其思想。反过来说，只有最全面了解外来的文学及其思想，才能在与之比较中选择、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化合在自己固有的、传统的土壤上，不断完善自我。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对固有的、传统的以及外来的文学及其思想不断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经过批评反思之后，自觉克服两种异质文学的对立，重新确立自己，进一步促进文学更为丰富的自我发展，这就是日本文学史的一贯脉络。

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是根植于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审美价值等民族土壤上的，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强固性和连续性，是不能轻易割断的。如果全盘抛弃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就失去辨别吸收外来文学的能力，失去创造本民族文学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固守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拒绝外来的文学，那么固有的、传统的文学就得不到补充，就难以产生新的活力，难以得到丰富和发展。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在内涵上是可以变化的，问题是要把握与外来的东西产生整合的可能性，并促使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运动。

可以说，日本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把握住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运动而解决了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使其最终避免了以上两种极端，在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结合点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即在外来的与固有的、现代的与传统的文学发生冲突时，既借助外来的、现代的东西，促进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又没有离开日本文学的根，以其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来吸收外

来的、现代的东西，促使两者共存与融合。日本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正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构建“冲突·并存·融合”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这一模式构成日本文学史的基本特征是：（一）以本民族为主体，以固有的世界观、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根基，以外来文学思想为两者化合的催化剂，内外动因互相作用；（二）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和技巧，但吸收技巧多于思想，即使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也在彼此并存融合的过程中促其变形变质，即促其“日本化”。

对日本文学来说，所谓外来的文学及文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四大观念体系：一是大陆（主要是中国、印度）佛教文学思想；二是中国儒、道文学思想（主要是朱子学、老庄哲学）；三是西方的基督教人本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些以观念形态表现的文学思潮与以主义形态表现的文学思潮一样，它们与日本文学思潮的关系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完全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古代如《文镜秘府论》、《日本灵异记》、《往生要集》、《正法藏眼》等之接受儒佛文学思想；近现代如内村鉴三之接受基督教文学思想，一些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作家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二）以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想拒斥外来的文学思想，古代如复古国学的种种，近现代如日本“浪漫派”的“回归古典”等，都是强调以国粹主义精神作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基调的思想；（三）使外来文学思想“日本化”，古代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和能乐等都是“以日本化”了的佛教文学思想作为前提。近代许多作家最初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最后在东西方文学比较中自觉地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或“桥梁”的

位置”寻找到民族的、传统的根 使之“日本化”。

所谓“日本化”，即在日本文学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冲突·并存·融合”模式内，既使外来的文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固有的、传统的文学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但变化、转化的主体力量是日本文学思想。在这个模式里，两种或两种以上异质的文学思想既相互拒斥，又相互交融，这不仅是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在大文化背景下直接构成了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可以说，一部日本文学史与世界各国文学史一样，既是民族文化精神最高成就的表现，也是一部与外国文学交流最高结晶的记录。日本文学史作为世界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整理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学遗产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它是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学交汇点上创造了自己历史的辉煌，完成了民族化和现代化，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珍贵的艺术精品、丰富的创造经验，以及充实世界的精神文明。整理日本文学的历史是具有独特意义的。

正如郑振铎所说：“文学史的工作”不仅仅是编述，却常常是在发现”。^①

第二节 地理文化环境与文学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风土、社会的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格以及相应的文学意识和美意识。同样道理，同一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风土和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下 这些相同的诸因素的综合作用 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 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 孕育成其传统文学和审美意识的共同属性。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又成为其共同的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成之源。而且它们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的文学和审美意识的形成 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 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地理文化环境的铸造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研究日本文学史的发生及其源流美意识的形成 离不开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风土的基本要素。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 有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 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是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 如《古事记》所记述的神代之初 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 从天上下凡 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 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与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八百万神。历史传说的日本民族以太阳为始祖，是太阳民族。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 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 日本皇帝是天皇。而且在他们编造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 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 都是归顺天孙 忠于天孙的事业。自古伊始 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天皇是神，是至上的 高于一切的 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 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 天皇是十全十美的 后来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传说 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 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 充分地

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日本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律诞生的。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之前，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和原始的文学意识、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和风土，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亿万万年缓慢地进行，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回环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处在孤立之境。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是山地，百分之三十是平原。没有荒漠，更没有大荒漠。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 3776 米。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大都狭小，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也只不过二百公里左右。所以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再加上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与北端虽然存在着寒带和热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现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融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民族正是充分吸收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风土的养分，形成其基本的性格。可以说，日本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

着日本国民的基本性格和原始生活意识和文学意识。

在民族形态上，古代日本社会已经形成日本人种的单一化。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但是，日本在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地理上处于孤立的位置。从外边流入的人种如蒙古种、马来种等甚少可能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当地人与外来者长期混同，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也就是说，日本各人种渐次混同并融合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民族的对立，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古事记》的神话里，明晰地记载着大和族一统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中完成的。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人种和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民族的冲突。

在政治形态上，国家成立之后，日本国家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在日本神话中早就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即使在近古武家时代，虽内战频仍也没有像中世纪欧洲和中国战国时代那种严重混乱的无中心状态。他们始终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社会的统一。所以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平和的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日本最初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其中贯穿日本皇室的权力，以天皇作为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象征。

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至大的。而这一古老民族诞生的性格，延续成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和日本文化的性格。这种日本历史的特质成为直接孕育日本文学及文学意识的根底。

在经济形态上从距今约八九千年的绳纹时代日本民族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大陆传入水稻日本民族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日本神话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中心也缘于此。《古事记》、《日本书纪》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比如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稻谷神和“天穗同命”等神以及将日本称为“丰苇原水穗国”并描述了农耕的事和与农业有关的祭祀。这说明日本从悠远的所谓神代开始就掌握原始农业技术，社会上占优势的是农耕文化的主宰者而不是宗教。尤其是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和风土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非常融合加上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使作为原始农耕的经济形态自然地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孕育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日本复合型的文化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作为文学和文学意识始源之一的宗教信仰为例，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的神道，它是原始农耕社会的宗教实体但其宗教共同的观念和礼仪以祭祀为核心没有特定的教义没有特定的偶像缺乏系统的宗教意识没有将神道的教权绝对化。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以后大陆儒、佛